

国际政治经济学刍议

宋 伟

内容提要: 本文从理论的定义出发,逐一分析了现存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各个流派。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建立一门国际关系的综合理论的重要一步,但是其本身的理论建设却很不成熟。本文以为,还原理论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国际体系的特征,也就无法提出一个核心变量。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只能描述国际体系内政治与经济作用的某一方面,而不能解释体系内的国际关系。国际制度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变量不够有力,都难以成为统一国际政治经济学。只有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概念可以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变量,而它的作用为霸权稳定理论和结构现实主义所证明。

关键词: 理论 还原理论 系统理论 结构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 理论的界定

国际政治经济学被称为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一门“显学”,但是时至今日,它仍然停留在一个支派林立、理论和方法混杂不清的“前理论”时代。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身并没有形成一门统一的理论,相反,它只是不同理论应用和解释的结果。例如,现在被普遍认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流派之一的霸权稳定理论,其实并不是一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结构现实主义在国际制度方面的应用。人们也有所谓“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的提法,对此,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指出:“说关于国际经济的一个理论向我们说明了某些政治问题,关于国际政治的一个理论向我们说明了某些经济问题,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个理论可以代替另一个理论。尽管化学告诉我们关于生物学的某些知

识,但它代替不了生物学。”¹

那么,如果要建立一门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大多数学者认识到,“国际政治学是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核心问题是如何进行这种结合。”²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放宽理论形成的条件,把一系列问题以及关于问题的假设、推理也当成理论。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指一系列关于国际体系的假设和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体系,而不是指一种特殊的方法或者理论的应用,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系列问题’这样的观念现在已经被广泛作为这个领域的一个正确的特征。”金德尔伯格在1970年出版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一书中,先是把国际体系内的政治和经济作用划分为“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国内经济——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国际经济”这三个方面,接着他就简化了难度,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七个问题。³这种观点由于其宽容自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欢迎。

然而,要形成有解释力的理论,这种投机取巧式的“专题”研究方法是毫无意义的。国际体系的各种因素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因此,如果作为一种描述,自然无法将某一因素或某一领域与其他因素和其他领域分割开来,不管这个领域是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对于理论建构来说,其任务却正是要将某一领域同其他领域分割开来,研究这个领域的组织。这个任务只有在某一领域内的组织和运动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时才成为可能。否则,我们只要研究单纯的个体便足够了。出于理论的严格定义,沃尔兹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可能比单纯的国际政治概念要好两倍。可是要创立这样一种理论,人们就必须指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是怎样与其他领域区分开来的。

¹ [美]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² Ejorn Hettne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Global Disorder*, Fernwood Publishing, 1995, p. 2.

³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Boulder, 1991, p. 3.

⁴ Charles P. 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首先人们必须限定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构,然后再对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内部的行为和结果做出解释。一种政治经济理论的建立可能代表着人们朝着建立一种国际关系的综合理论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讲清楚如何才能迈出这一大步。”¹

沃尔兹的这种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建立一门国际关系的总体理论是所有国际关系学者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如果能够建立一门国际政治经济的综合理论,朝这个终极目标自然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但是,如何提出一个统一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这样的结构存在吗?一般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加活跃,也更加难以控制,由此出现了所谓“跨国主义”学说。但是,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却仍然受到国家的集中控制,国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角色和地位变化不大。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既然不能统一成单一的政治经济关系,那么,用逆向推理的办法,如何可能存在一个单一的政治经济结构呢?因为,如果存在一个单一的政治经济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内的过程和结构内的关系必然受到它的重大影响,呈现某些相似的特征,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会呈现出一致性。可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形却好像恰恰与此相反。那么,建立一门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不是真的不可能?下面,我们先来考察已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看它们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个任务完成得好不好。

二 还原理论

按照金德尔伯格的分类法,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事实存在,但由于联系的隐晦而为国际关系学者忽略,所以研究者甚少。“国内政治——国际经济”的研究集中在“国家——市场”这个方面,而“国内经济——国际政治”的研究集中在霸权国的兴衰方面。这两种观点都属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还原理论。所谓还原理论,来自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对国际关系理论所做出的三“镜像”的分析。国际关系理论被分为三

¹ [美] 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219页。

个层次: 国际体系、国家与个人。¹ 将国际事件的结果还原于国家和个人的理论被称为还原理论, 探索国际事件的系统原因的理论被称为系统理论。

从目前来看, 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又包含了三种研究方向, 即市场之于国家的限制、国家之于市场应采取的政策和问题领域结构中国家和市场的权力关系。

(1) 对于市场之于国家限制的研究, 学理渊源是自由主义, 主要有所谓相互依存理论。美国学者理查德·库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 大西洋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最早从理论上分析相互依存关系的一本著作。他指出: 国际相互依存的中心问题是“像其他形式的国际交往一样,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既增加了各国因地制宜采取行动的自由, 同时又限制了这种自由”, 因此, 库珀认为, 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在享受不受限制的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带来的多种好处的同时, 又能让国家追求合理的经济目标。”² 可见, 库珀关注的中心在于相互依存对于国家经济政策选择的限制。在库珀的基础上,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复合相互依存关注的是经济的相互依存对于国家政治政策选择的限制, 也被称为跨国主义学说, 因为这个理论首先否定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复合相互依存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被归纳为三个方面: 多种交流渠道的存在, 低级政治地位的提升和武力不再起主要作用。”应该说, 相互依存理论揭示了“世界政治性质在变化”(基欧汉语) 的一面, 存在着很多闪光的思想。问题在于, 它不能解释大多数的国际政治现象。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里通过考察当时大国间经济关系依存度很低的现实, 提出“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 彻底否定了这一思想。他指出, 国际经济关系要受到国际结构的重大影响, 相互依存理论既不能解释大多数国际经济关系现象, 也不能解释大多数国际政治现象。³ 基欧汉思想的转变也说明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脆弱, 因为时隔不久, 他就自己否定了复合相互

¹ Marc A. Genest e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6, p. 3.

² 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pp. 4-5.

³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53 页。

⁴ [美]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第七章“结构原因和经济结果”。

依存的主要观点,重新转向国家中心主义。

(2)关于国家之于市场应该采取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它们关注的中心是国家(政府)形成国家经济政策时的作用问题。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把国家力量的最大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重商主义所主张的政策包括贸易垄断、外汇管制、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等。罗伯特·吉尔平写道:“我所理解的重商主义,是这样一种政府管理经济的努力,这种努力最大限度地满足本国的经济利益,而与其他政府为此付出的‘代价’无关……简言之,每一个国家都实行反映它国内经济需求和对外经济目标的经济政策,而不管这个政策对其他国家或整个经济体制的效果如何。”¹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在国际经济层面上也同国内市场一样,存在和谐的一切先决条件。国家应该把对国际经济的干预降至最小限度,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庞中英在仔细研究了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后发现,经济自由主义或者自由放任只不过是一种与重商主义一样的增加民族国家财富和力量的手段而已。按照他的说法,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具有世界视野的民族主义,而新重商主义则是一种保护性的经济民族主义。²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一部分是新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而对外输出资本,出于投资安全的考虑,同时加强对该地区的殖民化。因此,经济利益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本性,资本私有制是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理论不仅包涵了经济利益与经济政策的关系,还包涵了经济利益与政治政策的关系。从单元层面来看,它是唯一真正同时探讨了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的理论。在殖民体系瓦解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适应现实而有所发展,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比帝国主义理论更宏大,它既包括了系统层次的理论,也发展了单元层次的理论,但主要着眼于世界体系的结构和运作,是一种系统层面的理论。从单元层次的角度来看,新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解决办

¹ 转引自[俄]德罗波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几种主要的思想观念”,《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3期。

² 庞中英:《权力与财富——全球化下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140页。

³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St. Martin Press, 1991, pp. 7-9.

法历来争议颇多。例如,有的学者给予世界体系论的评论是:“世界体系论克服了依附理论的不妥,即一个边缘社会将总是一种‘依附性’边缘社会;发展总是一种‘依附性’发展。这种观点清楚地表明,只有摆脱世界体系才能获得成功的工业化。非常不幸的是,这种观点违背了历史的记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所有处于边缘地区的社会一直处于边缘。另外,不清楚的是摆脱世界体系是否是现代化的必然之路。”¹世界体系论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论述也是模糊的,寄希望于所谓的“反体系运动”,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观点,在世界经济这个基础并未动摇的时代,空谈“自由意志”、新的全球政治制度未免有唯心主义的色彩。²

(3) 问题领域结构中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探讨。这方面研究的突出代表是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她把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控制结果的权力)和结构性权力(控制办事方法)的权力。在她看来,结构性权力更为重要,并可以分为四个小的问题结构: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市场和国家在每一对结构中发挥着作用。以安全问题为例,尽管国家能控制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建立了国际制度,但常规武器市场非常兴旺,小型武器的交易难以管理。因此,无论是波黑战争还是校园枪杀,都反映了市场对于安全的影响。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既然国家和市场不可偏废,那么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重新定义研究的范围。按照她的说法:“当我们寻找问题的答案时,将超越国家概念,看到市场和它的操作者,看到非国家的权威。当我们观察这些后果时,将超越国家观念,看到‘民族’之外民众的各种组合形式,如阶级、性别、代际,甚至种属。”³因此,斯特兰奇的研究其实可以拓展为“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模式,在她看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斯特兰奇的确提出了许多标新立异的观点,她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

¹ Thomas R. Shann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Westview Press, 1996, pp. 210-211.

²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World-System after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0, No. 1, 1993, p. 5.

³ Susan Str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54-174.

方式的观察也比大多数学者更为全面和细致。市场在安全结构中发挥着作用的观点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观点为权力概念的泛化和非国家单元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论据。那么,她的理论可不可以称为一种独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呢?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述,不管是否提出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理论的根本特征是具有解释力,国际政治经济理论要对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大多数现象具有解释力。按照这个标准,斯特兰奇的观点与其称为国际政治经济理论,不如称为全球政治经济理论,因为它的目标和应用并不在于国际关系。她所提出的结构,并不是真正的国际政治结构,而是问题领域结构,说白了,是国家实力的内涵,是对统一的国际政治结构的分割或者细化。这种细化使得模式更加具体和诱人,但却无法解释重要和主要的国际政治事件,即使她的理论可以说明一些国家冲突和社会冲突的部分原因,还是没有能力解释大多数的国际政治现象和国际经济现象。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是无法用“国家——市场”的模式来解释的。读者很容易从她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中得出这样的体会,她的理论绝大多数是讨论国家与市场在四个结构中的地位,极少谈及这些结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尽管最后她试图得出美国在四个结构中的霸权地位并未衰落的结论。¹

三 系统理论

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系统理论也有三种: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这三种理论里面,由结构现实主义发展出来的霸权稳定理论被公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理论。所以,也有的学者把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划分为霸权稳定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三个部分。这三种理论或建立于成熟的系统理论基础之上,或本身就是一种经过严密论证的系统理论,所以影响最大。本文在这里所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并没有像通常的做法(如吉尔平)那样,把这些理论分别归类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理论建构的严谨。纵然单元理论和系统理论都发源于某种思想,但它们的路径和理论贡献却完全不同。第二部分所提到的重商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相应国际关系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国家

¹ 参见[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的政策性观点,与这一部分所讨论的三种系统层次理论完全不同。

1. 国际制度理论

国际制度理论发源于 70 年代的相互依赖理论,但是经过了重大修正。国家的中心作用被重新承认,国际制度而不是相互依赖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相互依赖深入发展、全球公共问题日趋突出的今天,国际制度由于其独立性和重要性成为国际体系的核心变量,通过提供公共商品、增加交易透明度、监督协议执行,在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理论上讲,国际制度完全符合建立一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是国际制度,国际制度制约着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国际制度理论在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存在两个重要的弱点:首先,并不存在统一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也就无法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统一的制约。在实践中,负责安全事务的国际制度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国际制度是分开的。这种状况尽管可能抽象出国际制度与总体国际关系的联系,却无法用来解释具体国家间的关系。而且,两种国际制度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在国际制度还不具有很强独立性的情况下。原因在于,国际制度总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分配,各国由于份额和地位的不同,自然围绕这个制度形成不同的利益关系。其次,国际制度本身是否具备国际体系核心独立变量的资格?笔者曾经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例,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初步的探讨。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国际组织的功能取决于国际组织的结构。由于国际组织仍然不是超国家的权威,国际组织内部仍然是无政府状态,所以国际结构的概念仍适用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结构制约着国际组织的效率和公平,有着难以超越的重大影响。¹ 如果国际制度本身还不具备称为核心独立变量的资格,以国际制度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空中楼阁。

2. 世界体系理论

最宏大的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体系理论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研究世界经济体系的运作为基础,提出了一个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并

¹ 参见宋伟:“关于国际组织的结构主义分析——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例”,《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1期。

讨论了这个体系的周期和趋向。¹ 如果按照国际关系理论的界定来看,世界体系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是“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两极化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南北关系的不可调和性。与依附论不同,世界体系论从国家体系的角度讨论了政治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当然,世界体系论者自己并不是这样来认识的。他们所提出的结构包括经济结构(不断扩展的单一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多个国家并存的国家体系)、阶级结构(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² 如果说经济结构还可以与政治结构相统一的话,那么阶级结构就无法归入到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来了。问题在于,世界体系论学者非常重视阶级这个概念,他们认为,国际经济关系的特点与其说是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世界共同体内的贫穷阶级和富裕阶级的冲突。”沃勒斯坦自己同样具有强烈的阶级情结。他强调,世界体系首先是一个经济的体系,甚至把“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作为同义语来使用。³ 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那么也许可以建立一门国际阶级政治经济学了。这个领域的结构被界定为国际资本家阶级与国际无产者阶级的力量分配,这个结构制约着两个阶级的相互关系。

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着缺陷。前者虽然能够解释南北关系的不平等和冲突,但是它无法解释大多数的国际政治现象,也与当今的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日趋松散,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也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欢迎。如果按照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应该是政治经济上形成两个阵营才对。后者把阶级观点运用到国际社会,同样脱离了国际关系的现实。民族国家并没有消解,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因,是国家政策的最终谜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90年代的中美关系中,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最强烈的是美国的劳工,恰恰是跨国公司的资本家支持给予中国这个待遇。所以,所谓的“国际资产阶级”和“国际劳工阶级”的提法在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并没有多大意义。

3. 霸权稳定理论

¹ Terence K. Hopkins ed., *World-System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p. 11-13.

² Ibid., pp. 222-223.

³ [俄] 德罗波特:前引文。

⁴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5页。

杰斐里·弗莱登和大卫·莱克在《国际政治经济学: 对全球权力和财富的见解》一书中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国际力量分配的变化如何影响国际经济的形态和类型。在这方面,最著名的现实主义途径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¹ 克莱斯勒教授则准确地论述了霸权稳定理论关注的两个中心问题:“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国家实力如何影响各国间的关系;第二,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的分配如何决定国际机制。”² 霸权稳定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正是这样来认识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其结果就是系统转型的“结构性战争”和新的国际权力体制的建立。”

1981年,罗伯特·吉尔平出版了他的名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这本书通常也被称为霸权稳定论的经典之作。³ 概括来看,吉尔平在书中主要探讨了霸权国的兴起、扩张、繁荣、衰落的过程及其原因,令人信服地解释了霸权的兴衰。因此,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发展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结构的理论。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并未着重解释国际结构是如何变化的,而吉尔平则提示了霸权体系结构变化的过程,充实和发展了结构理论。这本书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制度理论,制度是霸主制定的,也随着国际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涉及到与制度的关系,而吉尔平在这方面则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

从《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所代表的霸权稳定理论出发,对这个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有这样几种。一种看法是霸权稳定理论提示了经济力量

¹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eds., op. cit., p. 11.

² Stephen Krasner,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eve Smith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5.

³ [美]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三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

⁴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分布变化与国际政治权力变化的关系。这种观点是不完全准确的。即便吉尔平着重探讨的是霸权兴衰的经济根源,国际结构仍然是以国家的综合能力对比来确定,而不仅仅是经济力量的分布。另一种看法是霸权稳定理论提示了霸权国的力量与国际经济稳定的关系。这种观点同样也是不完全准确的。霸权稳定理论同样要解释霸权国的力量与国际政治稳定的关系。

这两种观点的出现,说明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存在认识的误区。一些学者局限于国际政治的经济学或者国际经济学的政治学,提不出也不愿承认一个统一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和这个政治经济结构对政治经济关系的统一制约作用。其实,霸权稳定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贡献正在于丰富和论证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统一制约:稳定的霸权结构决定稳定的国际关系。这里所说的稳定,是总体的稳定;这里所说的国际关系,包括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这里的霸权结构,是一个包括了政治能力和经济能力的总体政治经济结构。我们的理解还必须更进一步,霸权结构与国际关系不仅仅在于稳定与否,也在于一种等级关系的确立。国际制度是霸权国建立的制度,这种制度确立了在政治和经济诸多领域的国家间的地位等级关系。

可见,霸权稳定理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贡献在于:¹ 国际政治结构决定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等级性;² 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着国际体系中政治、经济关系的稳定性。

四 理论的反思

以上我们考察了现有的形形色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果是令人失望的。那么,从理论上讲,到底是还原理论还是系统理论能成为一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呢?答案只有一个:系统理论。还原理论也许能描述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一些现象,提出一些经验的解释,但是它却无法具备更为广泛的解释能力。国家的情况本来就千差万别,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这种情形使得抽象出某种统一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规律成为不可能。系统理论有什么优越性呢?一旦一个领域形成,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个领域的结构。只有了解这

个领域的结构的限制作用,我们才能从整体上把握这个领域。¹ 因此,要建立一门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确定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构,并阐明这个结构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即这个结构使得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体现出的相似性。

谈到结构,结构现实主义有能力结构,自由制度主义有制度结构,温特的建构主义有观念结构。制度结构我们在前面已经证伪了,那么,观念结构能否成为建立一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独立变量呢?² 笔者无意在这里对观念结构做详细的评论,仅仅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首先,观念结构其内容极为模糊,无政府文化最后被简化为敌我关系的认定,这样一种结构的内容是难以把握、界定,为国际政治经济提出一个研究日程的。

其次,观念结构的形成和变化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忽视了无政府状态对这一文化的形成的制约作用。事实上,建构主义所否定的不是先验的无政府状态,而是由国家自身造成的“无政府秩序”。³ 尽管国际政治确实是从霍布斯文化进步到了洛克文化,但是战争的烈度、国际竞争的残酷性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且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是依赖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的。

再次,观念结构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体系理论,如果体系中的主要成员改变了自己的观念,那么体系的变化就会发生。观念结构的稳定性并不如温特所说的那么强。考察国际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观念。如果统治国家的观念发生改变,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最后,如果把观念结构应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那么存不存在一个政治和经济方面统一的结构呢?事实上,许多经济制度和经济观念不同的国家是紧密的政治同盟,而许多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不同的国家是紧密的经济伙伴。同样,政

¹ 秦亚青教授出色地阐述了体系理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

² 对建构主义观念结构的认识,笔者主要依据的是[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³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1992, pp. 391–452. 说白了,沃尔兹所谓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结构,他在《人、国家与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中就是直接用的“无政府结构”的概念。而温特所批判的其实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秩序。

治制度和政治观念相同的国家,可能是经济方面的竞争对手;而那些经济制度和经济观念相同的国家也可能是政治方面的对手甚至是死敌。

因此,如果把观念结构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无法实证,也无法体现出结构的统一制约作用。到目前为止,建构主义也缺乏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

前面我们在讨论霸权稳定理论的时候,已经指出了它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两个重要贡献,那么,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可否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独立变量呢?如果可能,那么肯尼思·沃尔兹所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就不仅仅是国际政治学,同时也是一门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他自己否认这一点。

那么,沃尔兹是怎样来定义国际结构的呢?按照他的论述,“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结构定义使人们能够辨别类型的变化”:(1)结构首先是根据系统排列所依照的原则界定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的结构。(2)结构是根据不同单元的功能来界定的,而国际社会是由同类单元组成的。(3)结构是根据单元之间力量的分配来界定的。¹在这个定义中,我们最关注的是第三点,因为它涉及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如果结构只是国家间政治力量的分配,那么它就是一个纯国际政治结构;如果结构只是国家间经济力量的分配,那么它就是一个纯国际经济结构。因此,问题就在于沃尔兹所说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呢?二战以来,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了力量可转移性的削弱,导致政治大国不一定在经济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²这个观点是基欧汉和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赖以立论的“问题解决模式”的根本。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本文引用沃尔兹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如下:

“如果一国的各方面力量不在相互补充,那么,人们便可以只注重该国的长处,而忽视它的短处,这样,一些国家便可被视为超级大国,哪怕它们只具有过去作为超级大国所需的部分特征。中国有八亿多人口,日本有强大的经济,西欧既有人口,又有资源,只是并非政治实体。人们通常把未来当作现实,以补足所需的大国数目。当欧洲联合起来的时候……如果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一旦勤劳的中国人开发了他们的资源……那么,尽管假想的未来距今还有数十年,但我们听到了世界已不再是两极世界的说法。”

¹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19页。

² [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他探讨了力量转移性的问题,参见第144-151页。

“系统理论要求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不同个体的力量分布来确定结构。由于国家处于一个自助系统中,所以必须使用自己的综合力量以促进自身利益。国家的经济、军事和力量不能被割裂开来分别加以衡量。国家并不因在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独占鳌头,便被置于一流国家之列。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下述所有各项因素上所得的分数:人口的多少和领土的大小,资源的储量,经济力量,军事实力,政治的稳定性和能力。”¹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沃尔兹所定义的能力结构就是一个包括政治能力、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结构。结构的涵义是综合性的,可以把政治和经济综合起来。但是它能不能使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呈现出某些重要的相似特征呢?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结构有没有真正的系统性的解释力呢?在讨论霸权稳定论时,我们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且得出了结构对于政治经济关系的等级性和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但是,研究还不能到此为止。针对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相互依存理论,我们还必须解释国际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或者说紧密性的问题。我们将会看到,是结构制约和决定了相互依存,还是相互依存制约和改变了结构?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第七章“结构原因和经济结果”中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当今的国际经济与其说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依附的时代。1909—1913年,英法德的进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是33%~35%,而1975年的苏联和美国只占了8%—14%。他引用阿萨·布里格斯的话来说,19世界末和20世纪初是“相互依存的美好时期”。²可是,相互依存并没有阻止战争的发生,并没有消除由于结构性质的矛盾带来的影响。英德虽然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但是力量差距的缩小和随之而来的权力争夺却超越了相互依存的“微弱”作用。”那么,国际结构是如何影响相互依存这一国际经济关系的特征的呢?

首先,由于国际结构是一个无政府结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远远比不

¹ [美]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57—158页。

² 同上书,第169—171页。许多学者都用这个来证伪“相互依存和平论”的观点,参见 Paul A. Papayanon, “Interdependence, Institu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96, p.42.

»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1, Summer 2000, pp.14—15.

上国内单元之间的相互依存。特别是大国之间,由于大国都会走综合发展的道路,不可能在关键的资源上依赖别的国家,所以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中并不重要。

其次,当国际结构发生变化时,相互依存的程度会相应发生变化。相互依存是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力量差异的增大减弱了相互依存的程度。当大国数目减少时,相互依存往往会削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四十年中的全球政治中,只有两个国家处于权力的顶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美国和苏联独立于外部世界行事。美国和苏联在经济上对对方和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要小于先前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沃尔兹得出结论说,一个由极不平等的单位组成的世界几乎不可能成为相互依存的世界。¹

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制约和决定了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那么结构的影响和它对政治军事关系的影响是否一致呢,是否使它们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呢?沃尔兹在该书第八章“结构原因和军事结构”之中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以同盟政治理论为例,我们来看他的论述:

“在军事方面,两级世界的相互依存程度低,多级世界的相互依存程度高。在多级世界中,大国相互依赖,为的是在危机和战争中获得政治和军事支持。所以,查明哪个是有力的支持者相当重要。而在两极世界中,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第三方不能够通过撤出某一同盟,加入另一同盟来改变均势。因此,战后美国和苏联先后‘失去’中国,并未使美国和俄国之间不平衡不幸地遭到破坏或者严重地受到影响。……两个超级大国与各自的盟国之间的巨大不平等使后者的任何分化改组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足轻重。因此,盟主的战略可以是灵活的。在老式的均势政治中,同盟的灵活性既有利于战略的稳定性又有利于限制决策自由。在新式的均势政治中,情况刚好相反。同盟的稳定性有利于战略的灵活性,有利于扩大决策自由。”²

因此,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相互依存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结构决定了相互依存。结构的制约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军事关系出现了明显的相似特征。综合霸权稳定论的论述,我们归纳出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对国际关系三方面的制约作用:等级性、稳定性和紧密性。国际政治

¹ 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七章“结构原因和经济结果”。

² 同上书,第204-205页。

经济关系可以用一个统一的结构来得到解释。因此,与一般的观点不同,甚至也与沃尔兹本身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只有结构现实主义才是一门真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国际关系。这里的国际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军事关系各个方面。结构现实主义由于提出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从而有效地解释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那么,为什么国际政治经济学能够建立起一门系统层次上的理论呢?

五 理论的启示

对于如何建立一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大多数学者仍然在犯着和当初建立一门国际政治学时同样的错误。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人、国家和国际系统层次上的理论都很多,唯独系统层次的理论能够发展成真正具有解释力的宏大理论。原因在于,单元层面的情况过于复杂,即使对研究尽量进行简约,也会处于过多的、与研究似乎相关的事实所导致的混乱之中。¹ 以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还原理论为例,这些理论要么以偏概全,无法解释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如相互依存理论),要么变成了一种国家政策的研究(如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确,这些研究中有真理性的认识,例如相互依存制约着国家的选择,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变量不足以具备核心变量的作用。国际制度的问题也一样。制度理论的确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理论,它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由于国际制度这个变量存在的两个重大弱点而无法超越国际结构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国际政治经济领域能够发展出一门系统理论呢?

要发展出一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那么国际政治经济就要成为一个统一的领域。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之前,国家的军事能力和经济能力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军事大国在政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经济关系中无足轻重;而进入近代国际关系中,尤其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以来,跨国公司等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日益突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有所减弱。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这些不一致往往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其实,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作为一个统一的领域是客观的事实:

首先,自进入近代以来,国家的军事能力和经济能力变得更加难以分割。强

¹ [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大的军事必须依靠强大的生产力。单一优势的国家无法在综合国力的排列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非经济大国成不了真正的军事大国,而非军事大国的经济大国也必须依附于最强大的国家。还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经济和军事能力并不是简单相加的,两种力量的综合是一个长期互补的过程,单一优势的国家要转变为综合国力的强国并非易事。因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基本单元的强国都必须是政治和经济大国,它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同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尽管跨国公司等非政府行为体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日益扩大,但是,国家对经济领域控制作用的弱化并不意味着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主体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国家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也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经济自由主义仍然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根据吉尔平的研究,跨国公司的确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因而它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美国与西欧之间在防务上的联系,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这些经济活动以及其他跨国活动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¹ 既然如此,那么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统一就是不矛盾的。

因此,国家间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军事关系都受制于国际结构,国家仍然在这些关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即便某些跨国公司的力量胜于一些小国,但是它们本身仍然只是大国主子的附属。国际关系还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领域。我们所能建立的也只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全球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宋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陈志瑞)

¹ [美]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序言”第 2 页。

riety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that has many members but without fixed enemy. Since the cohesion within NATO is weakening and the dependence of both America and its European allies on NATO is decreasing, the ally will enter a period of unstab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O from a military ally to a security community within the scope of NATO is in the interest of regional stability and security.

70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Russia

Wang Shuchun

The conceptions of security have been transforming from traditional ones to new on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a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is a historical change. At present, the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traditional, transforming and new conception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could also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that include the military ones, military and developing ones, and developing ones. Nevertheless, at present, the transforming conception is a mainstream one, while the military and developing strategy is in the dominate position amo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it is certain that Russia's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be affected by the transforming one, since it is only came into being after the Cold War.

80 On “Authoritative Alliance” Theory

Wang Fan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authoritative theory”. used to explain the reality of alliance in the post-Cold-War world. The theory discards the traditional theory that alliance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reat, and holds that current alliance system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are communities that share common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rests. It is owing to the existence of shared interests that the current alliance system could merge and grow spontaneously and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alliances. Furthermore, the current alliance enables the traditional alliance to survive after the former threat disappeared. At present, the traditional alliance is transforming into the “authoritative alliance” that has broader purposes. The alliance emphasizes group interests and sticks to the durability of alliance. And having its own law of development, it could grow and expand through its continuous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tners, which is clearly shown in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NATO.

92 What is Tru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es

Song Wei

By examining the concepts, this paper analyzes each branch of exis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argues that, although IPE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IR theory,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far from mature. Since Reductionist theory could not catch the whole fe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t is impossible to provide a core variable. The IPE of Reductionist could ex-

plain certain interac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but not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in the system. In the meantime, both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and World-system theory could not function as IPE either, for their core variables are not strong enough to provide supports. It is only Structural Realism that could provide the core variable in IPE.

109 **From Neutralism to Post-Neutr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Swedish Foreign Policy**

Jin Ri

By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uthor classifies the diplomacy of Sweden into three periods to ex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wedish non-alignment and Neutrality tradition.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he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tradition; and in the second part, Swedish non-alignment, neutrality and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parts focus on the deviation of Swedish traditional neutra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mise of the bipolar system, the challenge of national welfare system Sweden is facing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European single market. Besides the reasons,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wedish foreign policy from neutralism to post-neutralism are examined.

REVIEWS

121 **About the Studies of EU Social Policy in China**

Zhou Ho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ant's "Perpetual Peace" and Habermas' Comment

Xiong Wenchi

143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History of English School—A Key to Understand English School**

Xu Yali

ACADEMIC ACTIVITIES

150 **"Eastward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by Italian Ambassador to China Raffaele Trombetta**

Luo Hongbo

151 **Eastward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Hungary, by Hungary Ambassador to China Bayer Nihaly**

Ren Dingqiu

153 **"The Transforming Period of Spain", by Spanish Ambassador to China Eugenio Bregolat**

Zhang Min

Editor's Note